

目 录

前 言	编 者
玉环县建置沿革	陈书钊整理 (1)
陈愚亭先生生平事迹	步 风整理 (4)
郭云观传略	建 宇 (11)
郭云观年谱	郭思永 (17)
回忆父亲的仕途生涯	以家麟 (23)
“草鞋县长”	郑新维 李平 邵再枚 江贤圃 (25)
在抗战的年代里	王咏樵等 (28)
“我就是以定邦”	郑新维等 (31)
我所了解的彭世麟其人	高飞鸢 (33)
大聋先生事略	朱仁巴 (40)
楚门文旦	王茂世 (45)
坎门郭源顺商号	郭缉中 (49)
玉环戏曲流传简况	林思韬 (57)
玉环民俗浅谈	张一芳 (64)
打盐关记略	胡德钊 (69)

玉环军民英勇歼敌记·····	傅世扬 (75)
玉环城隍庙庙会盛况·····	章奎元 蔡蔚文 (78)
我所知道的玉环筒师·····	叶一梅 (86)
坎门学堂的创立·····	支超明 (88)
解放前城坎公路筹建情况·····	肖然志 (90)
玉环最早的碾米厂·····	章奎元 (92)
略谈玉环织造厂·····	肖然志 (93)
玉环武术小考·····	陈一芳 (95)

玉环县建置沿革

陈书钊整理

玉环县设治历史较短，根据玉环岛上三合潭地方出土的磨制石犁等文物证实，最晚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

夏、商、周时，根据《禹贡》九州之说，今玉环县境当为“扬州之域”。

春秋，为越地。

战国，属楚国。

秦，属闽中郡。

西汉，初属东瓯，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于东瓯地置回浦县（大致包括今温州市和台州、丽水两地区），隶会稽郡，今玉环县境为回浦县地。

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27年），改回浦县为章安县。永和三年（公元138年），析章安县东瓯乡为永宁县（包括今温州市辖地），遂为永宁县地，仍隶会稽郡。

三国，属吴国，仍为永宁县地。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分会稽郡东部置临海郡，永宁县遂隶临海郡。

东晋，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分临海郡置永嘉郡，以永宁县为郡治。永康二年（公元374年），分永宁县置乐成县（今乐清），属永嘉郡，今玉环县境遂为乐成县地。历南朝宋、齐、梁、陈不变。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永宁县为永嘉县，隶处州。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撤乐成县并入永嘉县，今玉环县境遂为永嘉县地，隶括州（开皇十二年改处州为括州）。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分括州置东嘉州，分永嘉县复置乐成县，今玉环县境又为乐成县地，隶东嘉州。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又撤乐成县并入永嘉县，今玉环县境复为永嘉县地。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废东嘉州，永嘉县隶括州。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于永嘉置温州。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复置乐成县，隶温州，今玉环县境复为乐成县地。

五代十国时，乐成县属吴越国。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吴越王钱俶避梁太祖父亲朱诚名讳奏改乐成为乐清，今玉环县境为乐清县地。

宋、元两朝不变。

明，初仍为乐清县地，隶温州府。洪武二十年（1387年），倭寇扰边，徙玉环岛居民于内地，并在楚门建城设所，初属盘石卫，后属松门卫。成化十二年（1476年），析乐清县山门、玉环两乡六都地属太平县（今温岭），隶台州府。从此，今县境的楚门半岛为太平县地，玉环岛上分水山以东桃花岭以北属太平县，余属乐清，但仍迁弃。万历元年（1573年）及万历二十年（1592年），先后两度计议垦复玉环岛，旋行禁止。

清，初为太平县、乐清县地，分隶台州、温州两府。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因郑成功占据台湾抗清，下令撤边海三十里而空其地，今县境又遭迁弃。康熙八年（1669年），在境内设防，次年设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归入清朝版图，界始渐复。雍正六年（1728年），置玉环厅，隶温

州府，在玉环岛中青山麓建厅设治，并筑城墙，此为玉环设治之始。辖地周围七百余里，包括今玉环、洞头两县辖地和温岭县的石塘等地，还有乐清县的大荆、芙蓉、蒲岐、盘石及瓯海县的灵昆等地（石塘等地在乾隆六十年划归太平县，其余地方陆续划归乐清县和永嘉县）。

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存县，并推行道制，改玉环厅为玉环县，隶瓯海道。民国十六年（1927年）废道制，地方行政实行省、县二级制，玉环县直属于省。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建立行政督察区制，玉环县属浙江省第十县政督察区。此后，本县所属行政督察区的名称屡有变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本县属浙江省第五行政督察区。

1949年4月7日，本县解放后，仍称玉环县，属温州专区，县境包括今玉环、洞头两县地。

1953年8月，原辖地洞头、三盘、大门诸岛划出，另立洞头县。

1958年7月，洞头县撤销，其辖地重新并入玉环县。

1959年3月，玉环县撤销，原洞头县辖地划归温州市，玉环县辖地并入温岭县，属温州专区。

1962年4月（国务院批准日期），恢复玉环县建制，属台州专区（后称台州地区），辖地即今之县境，以迄于今。

陈愚亭先生事迹

步 风整理

陈愚亭先生又名齐良、宗直，芳杜乡西林村人。光绪己丑年（公元1889年）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国学生，父亲康贡生。少时，在温岭梅花庵举人赵兰臣先生私塾攻读，芸窗十年，学业大有长进。十七岁中秀才，榜标第一。青年时代，曾在温岭岳父家及赵氏私塾做塾师，兼学中医。他生性聪慧，记忆过人，又肯笃志钻研，医学颇有成就。后来，他辞去塾师，专心行医。由于他医术高明，用药谨慎、稳妥，疗效显著，因而在温、玉两县负有盛名，只要一提“先生”二字，人们就知道是指陈愚亭的了。

先生为人厚道，平易近人，上至官吏，下至庶民，不分贵贱，一视同仁。

他虽出生在富裕家庭，但由于从少生长在农村，深知农民的疾苦，因而能助人为乐，扶贫济困。在漫长的岁月里，他能体察世情，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染污泥浊水，立足于不败之地，实在难得。地方父老景仰他的为人，赠给他“乐善好施”匾额。

解放后，先生被评为开明士绅。土改时，他上台交田契，台下群众欢呼“端凳子给先生坐”。后来，县里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生被选为人民代表及常务委员，1953年召开县人

民代表大会，先生也当选为人民代表、常务委员，这表明他能顺从民意，跟随时代步伐前进。

一、支持革命

先生在地方的名望较大，玉环每任县长到任，都先到他家拜访。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玉环成立临时参议会，二十一名参议员名单上报，省政府圈定先生为参议长。抗战时期，玉环县成立各界抗日救亡动员委员会，推选他当主任。他在旧社会有这样的地位，却没有站到反动派的一边，反而对革命事业热心地给予支持。

一九三〇年，住在芳杜中赵的应保寿，揭竿闹“共产”，先生知道他平时好交江湖义友，爱打抱不平，就主动赠送他两支短枪，使他的队伍得到壮大；后编为红十三军第二团海上游击大队，应为大队长。应保寿出走后，其妻隐匿在西林，先生暗中派人送米，照顾她的生活。

一九三八年元旦，玉环、温岭两县地下党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如何联合发动抗日宣传等事宜。当时有地下党员董仲升、叶克东和温岭县委书记梁耀南同志，还有林任望、叶斐英先生以及另外三位农民、渔民代表参加，地点就在先生家里。

一九三九年，先生是东方小学校董，他对进步事业十分赞助，对进步教师金廷辅、汤佑平等非常关心，为他们在学校工作、学习、传播革命道理提供了有利条件。

后来，林任望离校，校长位缺，先生挺身而出，主持校务。从西林到楚门，往返路程三十多里，他早出晚归，不辞劳苦。

一九四〇年，王咏槐（地下党员）介绍陈梅欣（地下党

员)担任东方小学教导主任,先生乐意聘用。后来,陈梅欣提议王咏樵担任校长,先生亲自出面聘请。从此,东方小学成为地下党领导下的红色堡垒。日常,校内抗日宣传和传播革命真理,先生不仅不反对,而且还暗中相助,使学校地下党组织顺利地开展活动,并扩大了组织,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革命干部。由于先生和王咏樵的关系,连县长以定邦也开只眼闭只眼——表示默许。

一九四九年三月,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当地称三五支队)解放楚门,支队部选定驻进先生家,他的家就成了作战指挥部。

二、爱怜疾苦

先生家里长年雇工做米,供应当地穷人日常需要。不管现钱、赊欠同样供给。有一回,当地有个妇人向他族婢赊米,族婢不给。妇人流着眼泪出来,恰巧碰见先生。先生问她为何悲伤,她如实诉说。先生取钱给妇人,叫她再去买,妇人转忧为喜,接钱叩谢,余米回家。

族婢买面专拣好的,上翻下挑,剩下短的、乱的不要;卖面小贩又不好不给,只是摇头叹气。先生对小贩说,“她送人情需要拣好的,我自己吃不要紧,都称给我。”于是皆大欢喜。

民国十八年,玉环大荒,芳杜虽是个鱼米之乡,但粮食也十分紧张。市上米珠薪桂,外地人也到先生家里买米度荒。先生家里存粮有限,眼看已经无法应售,不得不另想办法,帮助乡亲们度过荒年。他派人到江苏省镇江购米,运回后敞开供应。大米贵价进,平价出,亏空部份,他卖田弥补。先生祖业

留下田地八十多亩，单在这一项义举上，就去掉（有的当了）一半。

三十年代，劳杜有个小二头，其妻被人强占拐往上海。小二头走投无路，向先生哭诉，恳求他帮助。先生同情他的苦楚，自己备了一份礼物，写好一封信，叫他送往桐林乡大沙湾交给毛幽谷先生。

毛幽谷和张叔夜有交，事情很快得到解决。小二头夫妻破镜重圆，居生一子，家庭和睦，邻里庆喜。

先生素性怜悯穷人，凡有人到他家或在路上向他求借，有求必应。有个温岭人向他借谷六十斤，先生称谷给他，不问姓名地址。第二年，那人送谷来还，他倒忘记了这件事。

解放前，“金元券”一夜跌一半，借户送钞票还账，收回钞票没用场，先生从不计较。

西林有个张邦利，大雷头人，为人忠厚老实，常在先生家里做短工。成家后，没房屋，一家十口，六男二女，东租西借。先生看在眼里，怜在心头。他的二婶（先生顶继）造了三间坟庵，先生趁机作主，安排张家居住。

张邦利有了安身之处，勤劳俭朴，生活一年年好起来，手头有了点积蓄，心想自造房屋，苦无宅基。先生得知，就把樟树园的一亩三分土地卖给他家造新屋，地价为稻谷三千斤。张对先生此举感激不尽，当即交清全部稻谷。先生问他：“年关在即，你一时交出这许多稻谷，自己吃的可有？”张说：“茹丝够吃，生活过得去，年糕、粽子不吃不要紧。”先生甚有怜悯之心，叫他留下一部份，等明年再交。

解放前夕，先生认识到卖土地不妥，便把所得地价全部退还（稻谷四百斤，其余折代金），土地依旧给张家造屋。从

此，张家有了宅基，新造楼房五间，余基还有一大片。

三、治病救人

四十年代，温岭坞根街头有升药店，生意清淡，年年亏本。店主亲自到西林，聘请先生去坐店。先生见他一片诚意，路虽远，也就答应了。病家闻讯先生在那里坐店，纷至沓来，找先生看病。不上一年时间，这升药店扭亏转盈，店主高兴，病家欢喜。当地有个病人，生慢性病，无钱买药，先生一面给他诊治，一面替他付钱买药，直至病好为止，这件事至今仍有人在传颂。

清港的王大生药号，几乎要倒闭，先生去坐堂行医，使他重振营业，生意兴隆。当时有个病人去看病，身上衣着单薄，冷得牙齿相打，先生见他可怜，就脱下自己的夹袄，给他穿上，然后再看病。

先生有脚气病，远道出诊要坐轿。自己出钱雇轿伕，从不向病家收费和派饭。轿伕吃饭，先生付钱。每逢上岭，先生总借故下轿自己走。

玉环车辅有病，派人来请先生诊治。先生在东青岭脚下轿，吩咐轿伕在街上买吃，自己步行到病家。后来，病家送“盒篮担”到西林道谢，先生佯装领情，让来人挑着“回礼”回去。主人检点原礼物一样不少，还多了一斗糯米，外加一个“红纸包”。

先生早晚在家，经常有人来开药方或看病，他情愿放弃自己休息时间，热忱接待，从不厌烦。茶头有一贫苦产妇，月里患了重病，男人担心得吃不下饭，跑去请先生出诊，他用一双恳求的眼光看着先生，因天气寒冷，很难说出口。先生看出他

的心思，就立刻起身。到了病家，先生急待进房替病妇看病，那病家站在房门口阻拦，说产房腥臭，由他挽扶病人出房来让先生看诊。先生叫他不可造次，管自跨进房门，替产妇检查病情，诊毕出来开好药方，吩咐病家买药。男人说先要去借钱，先生随即从口袋里取出一元钱催他快去。

先生对贫穷疾苦的病人经常雪中送炭，解囊相助，因此，人们都称他“愚亭佛”，说他有“菩萨”心肠。

四、不求名利

一九五三年，先生参加楚门联合诊所，依旧就业中医；一九五六年，先生就任玉环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职务。一九五七年调资，先生被评为九级，月薪一百另八元，经地区批准，他的月薪提升到一百二十多元。先生认为太多，自愿领取原来月薪一百另八元，领导再三劝说，他坚持不领。领导没办法，只得把他的余款存入银行。

一九五七年冬，先生患脚病，要求领导准他辞去副院长职务，自愿回楚门联合诊所工作，领导不予批准，叫他安心休养，治好疾病。先生写信给县领导，再三恳切要求，“……辞去副院长职务，回楚门联合诊所从医，愿领月薪四十元足矣，如蒙恩准，则愚亭有生之岁月，皆出于领导之所赐也！”

五、热心公益

芳杜是个偏僻乡村，向从来没有学校，农民子女要想读书，就得到外地去入学。为了使农家子女有读书的机会，先生早就想在当地办一所学校。

一九二三年，他辞去温岭塾师工作，回到家乡，筹集资

金，创办了港北第八学堂，即后来的补山小学，自己尽义务，担任国文教师。

在二十年代后期，先生曾在省防军的胡子漠司令部当过上尉书记。部队驻防在湖州，当地父老兴建孤老院，先生十分赞同，把自己积蓄下来的工资全部捐献。因此，当时的浙江省省长张载阳赠送“热心公益”匾额一方。

一九三八年，他和林任望先生一起，在楚门向各界集资筹办东方小学，大家推他为校董。学校初办，师资不足，先生自己尽义务，兼任语文课。

林任望先生去后，东方小学缺校长，先生出来主持校务，鼓励学生坚持学习。后来他聘用王咏樵担任校长，使东方小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培养了一代新人。

兴办东方中学，先生又带头捐助良田十亩。一九四六年创办玉环中学时，先生担任校长，校里用具缺乏，先生从家里带来闹钟、热水瓶、算盘等等资助学校应用。操场没有着落，先生拿出在西山后的五亩好田，向楚门邱家调换晒谷坦作为学校操场，使学生能正常地开展体育活动。

一九四一年，温岭王志超（地下党员）在家不能立足，由朱仁禹、胡义夫共同推荐，先生表示欢迎，并请他到芳杜任教。王在校期间，伙食开支，都由先生负担。

一九六〇年，先生因病逝世，享寿七十一岁。

（本文根据王照明、林汉泽、陈书钊、戴汉节、陈笑霞等和档案馆、党史办、《陈氏宗谱》提供的材料及笔者多方采访整理而成。）

郭 云 观 传 略

建 宇

郭云观，字凤畴，号文田，浙江省玉环县坎门镇人。1889年12月16日出生于坎门，1961年3月31日病故于上海。

他自幼聪颖过人，敏而好学，十六岁时，应科举考试，成为末科秀才。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天津北洋大学攻读法律，1915年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系。1917年考取官费留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国际法。1919年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1920—1932年间，曾任大理院推事，燕京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课，并曾暂时代理燕大校长。1932年以后，曾任司法行政部参事，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上海高等法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光华大学法律系主任，复旦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等校教授。

解放后，他担任东吴大学法律研究所教授，带病坚持教学工作，至1953年因病退职。其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确定聘请他为市文史馆馆员，因年迈多病，未能就职。1961年3月31日因脑溢血症，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三岁。

郭云观教授在国内各大学任教国际法达三十年之久，桃李满天下，其中不少人现在是高等法学教育骨干及司法界、律师

界的中坚。他的学生施觉怀，现在担任海牙国际法院中国籍大法官助理。闻名中外的国际法专家王铁崖教授是他在清华大学任课时的学生，追忆当年郭云观教授讲课如何循循善诱，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习题作业又如何能联系实际，引人入胜，对业师常怀系念之情。今天在华东政法学院讲授国际法的聂昌颐，是郭云观在解放后培育出来的学生。他说：“郭老说过，在旧中国，外国领事在我国领土上有裁判权，对本国侨民行使管辖权，直接适用自己国家的法律，俨然是国中之国；至于我国在海外的侨民，外国法院在处理他们的案件时，如果不符合国际私法准则，却无人过问。在当时情况下，国际私法虽然实践价值有限，但是仍有研究之必要；今天新中国已建立，为了维护我国权益，学习和研究国际私法已成为当务之急。”聂昌颐又说，“郭云观教授当年的预见，已被事实所证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国际私法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郭云观的法学著作有《法学丛论》、《法官采证准绳》、《国际私法习题举例》、《中国国际私法新草案》、《中外条约司法部分辑览》等书，均于解放前出版。解放后，聂昌颐于1979年辑注了郭老师的旧著，出版了《国际私法中国习题集》。

郭云观教授献身法学教育，也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美国哈佛大学法律系主任、著名的庞德教授，曾于解放前夕，专程来华，以重金和高职礼聘他去美国任教，并给予全家赴美的优惠条件。郭云观出于对祖国法学教育的热爱，不为名利所动，坚决谢绝。

1933年起，郭云观担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当时

领事裁判权已被废除，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由中国法官受理一切中外民、刑案件。但公共租界政治背景十分复杂，外国人掌握租界行政大权，流氓帮会势力十分猖獗，对郭云观施加压力，威胁利诱，百般阻挠我国司法权的行使。郭云观以“三不能：淫、移、屈”六个字自励，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外国人及其走狗对他无可奈何。他捍卫了国家的司法主权。

抗战开始后，上海沦为“孤岛”，中国所有军政机关均已撤离，留在上海的只有特区法院，在日伪重重包围下，处境十分险恶。留在租界的中国司法人员，经常收到日伪寄来的恐吓信，甚至附有子弹。郭云观坚持民族立场，率领全体司法人员与敌伪相抗，手书文天祥的《正气歌》与僚属共勉，准备随时以身殉国。在此期间，一位民庭庭长被敌伪暗杀了，全体人员仍坚守岗位，毫不动摇。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事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层层包围法院。郭云观决定突围，连夜焚烧了全部重要文件——为了防止被日本人发觉，他紧闭全部门窗，将一叠叠的公文投入火炉，室内浓烟滚滚，呛得他喘不过气来，高度近视的双眼疼得无法睁开，泪水直流，汗水浸湿了内衣也顾不得，只忙着把公文纸往火里塞……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景，笑着对人说：只有这时我才充分体会危急时刻是怎样一种心情。次日凌晨，他化装为勤杂人员，逃出日伪包围圈，避入法院附近一位友人开办的医院里。敌人发觉他已出走，十分恼怒，在上海各报登载公告，悬赏缉拿，并下令搜捕家属。幸其夫人及子女事先已闻风声，改姓换名，避难亲友家。他自己则在亲友帮助下逃离上海，化名蔡施福，隐居宁波乡下，生活非常艰苦。此时常讽诵

文天祥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自勉，并潜心研究法学，为抗战胜利后再献身教育事业作准备。1945年秋，因病重，不得已秘密赴沪就医，不幸为日本宪兵司令部侦知。敌宪头目堀江亲率宪兵多人到他隐居处搜捕，还拘捕了他的长子。敌宪见他奄奄一息，稍事移动，就会停止呼吸，乃先予软禁，待其病情好转后，迫使就范。他身藏大量安眠药，做好以死相抗的准备。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日本无条件投降，才幸免于难。

郭云观虽历任国民党政府高级职务，但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特务横行，深表不满，故始终不曾参加国民党。他手下有一个一般职员，国民党认为有政治嫌疑要抓，郭得知后，即授意那人辞职离开，不让国民党特务侵犯他的“司法独立”的尊严。在职期间，他任人唯贤，公正廉洁，不徇私情，表现了高尚的个人节操。他也十分注意下属的操守。他有一条禁令，不许法官家里安装电话，防止当事人利用电话与法官通气。

解放前夕，他担任上海高等法院院长期间，其几个亲属（均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向他宣传党的政策，使他开始对党有了认识，并接受了党的政策影响。

一九四九年春，据传李宗仁代总统曾密令上海市释放一批在押的政治犯。此举在高等法院内引起争议，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当时上海高等法院直属女监曾囚禁着一批女共产党员。女监监长柯俊杰、总务课长林晓明、警卫课长李梅魂等人倾向革命，共同设法报请高院以普通刑事犯名义将一批在狱的女共产党员释放出狱。此事得到郭云观的支持，予以批准，从而为党保存了力量。中共地下党员朱世政于一九四九年初被捕，关

押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常德路拘留所，郭云观获悉后曾派亲属持其名片，找特刑庭和警备司令部有关人员交涉，设法营救。他还为中共地下党在法院的负责人之一王容海的掩护职务提供了方便，积极地支持了他的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司法行政主管部门部长要他去台湾。高检处首席检察官杜保祺和地方法院院长查良鉴也来请他一同逃往台湾。杜保祺在上飞机前还打电话来，说已经为他一家保留了飞机座位，劝他当机立断。他也就当机立断：“不走！”上海解放，军管会法院接受处成立后，郭云观认真负责，一一具册，将法院所属全部档案、财产、人员、枪支，完整移交，受到有关领导同志好评。王容海（解放后在上海司法界历任重要职务）于1984年春病逝前，曾就郭云观解放前为党做的工作，写了书面材料，上面有这样一段话：“1948年在旧法院开展地下党活动期间，……在掩护职务上得到郭云观父子的积极支持；他们并接受共产党的影响，为保护当时在狱政治犯的生命安全及完整保存档案资财，作出一定贡献。”这是符合实际的。

郭云观在日伪侵占上海时，紧急焚毁重要文件，冒死突围，隐姓埋名，坚决不与日伪合作；而当共产党进军上海时，则丝毫不顾虑自己担任国民党政权高级职务的身分，坚决拒绝逃往台湾的劝诱，保护了法院全部档案，于上海解放后一一具册完整移交；两相比较，足以说明郭云观是非分明的政治态度。解放后不久的某一天，他在与人谈话中，提到杜保祺约他一同逃台时，说道：“共产党来，逃什么！又不是日本鬼子打进来！”郭云观态度如此明朗，这是与他已经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影响分不开的。

1950年冬，抗美援朝战争开始，郭云观拥护党的领导，支